

## 第一章 上古汉语语音节结构

至今，仍有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一个古老但实际上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假设：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这一假设也被当作事实写进一些古代汉语的教科书中<sup>①</sup>。事实上，我们要是理性地对此假设加以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一假设得以建立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一假设得以建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上古汉语的大部分语词只用一个文字符号来记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直截了当地依据这一事实就可以简单推导出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本来研究语言大可不必一定要牵涉到文字，甚至我们所研究的好些语言本就没有记录文字。我们借助文字研究上古汉语只是由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上古汉语的语音，而文字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上古汉语语音的一座桥梁。常识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得以存在的惟一理由是文字忠实地记录语言。因而，创造或采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语言与语言本身并没有存在必然的联系<sup>②</sup>。任何一种语言并没有限定它一定要创造或采用某一种特定的文字。就文字起源而言，古老的文字大抵源于古人对其所处周围自然物形状描摹的图画——文字画。故此，古埃及人、古玛雅人、古华夏人、古苏美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页，商务印书馆，1983。

尔人等，尽管他们的语言并不一定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他们彼此所创造的文字单单就形体而言总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彼此之间所使用的文字相似，并非因为他们的语言也彼此相似，而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物的形状是一样的。古埃及人所看到的太阳和古华夏人所看到的太阳同是一个太阳，两者的形状是一样的。因而，古埃及人所创造或古华夏人所创造用于记录“太阳”的文字自然也近似。我们自然不会因为这些古老民族各自独立创造的文字有相似之处而得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相似的结论。自然，也没有哪一位理性的学者会这样做。正由于文字与语言本身并没有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因而无亲缘关系的语言可以选择、采用相同的文字；相反，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可以选择、采用不同的文字。前者如印尼语和英语、日语和汉语，而后者如藏语和汉语、泰语和汉语（假如泰语和汉语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有亲缘关系的话）。印尼语和英语是语言类型完全不同且没有任何发生学关系的语言，但是两者可以用相同的拉丁字母记录他们彼此的语言；日语与汉语也同样有效地用汉字来记录他们各自的语言。藏语和汉语尽管有亲缘关系，但是记录藏语的藏文和记录汉语的汉字却断然不同；泰语和汉语也是如此。显然，我们不会认为汉语和日语同用汉字而断定汉语和日语有亲缘关系，或者藏语和汉语采用不同的文字而否定它们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故此，同一语系的语言可以采用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字，比如汉语的甲骨文、藏语的古藏文、纳西的古纳西文、傣语的老傣文、彝语的古彝文等等。正因为文字和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所以同一种语言也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选择、采用彼此不同的文字体系。比如土耳其语，本来用阿拉伯字母，而后来则改用拉丁字母；维吾尔语就曾经采用过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与拉丁字母。但是，这种文字体系的更改并不能影响语言本身，或影响语言本身的使用，即语言仍旧是原来的语言。越南语、朝鲜语都曾经采用汉字来记

录，后来两者都放弃了已经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汉字。前者改用拉丁字母而后者则采用自己创制出来的文字。显然，并不因记录文字的更改而改变了越南语、朝鲜语的性质。故此，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利用拉丁字母为许许多多本来没有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言创造了记录他们语言的文字。否则，我们只能为每一种民族语言创造一种特殊的文字。

故此，我们根据这一常识就可以知道古汉字和上古汉语之间同样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种认为汉语必须选择汉字的观点不论从任何一种角度来看都是难以站住脚的。那种根据汉字推定汉语的音节结构，再根据这一推定出来的汉语音节结构推定汉语必定采用汉字，显然是陷入了“循环论”的怪圈。这在逻辑上是不足取的。上古汉语之所以选择古汉字来记录也不过是历史文化的巧合。我们至今仍使用这种文字也并非是一种必然，尽管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反作用于汉语。虽然现代汉语是由上古汉语演化而来的，但是我们依然无法事先知道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自然我们也不可能根据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反推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因而，利用古汉字这一上古汉语的记录符号作为我们研究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桥梁是我们在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选择。我们无法用其他更好的手段或材料来重现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故此，根据上古汉语的一个语词常常只用一个汉字来记录的事实，我们无法类推推出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更不能把这一结论作为我们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假设前提。

一个古汉字等于一个上古汉语的语词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上古汉语语词就是一个音节的语词。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日语是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而一个汉字在日语中既可以记录一个单音节的日语语词也可以记录一个多音节的日语语词（中古汉语的阳声韵、人声韵，日语借词中往往表现为双音节语词），其中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日本汉字更是如

此。相当多的日本汉字所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多音节的语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短语。汉字在朝鲜语中的使用也是如此。显然，我们要是事先并不知道日语的音节结构，仅仅依据其记录符号或许也会类推出一样的结论：日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但是，由于我们已经事先知道日语的音节结构，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记录一个多音节日语语词的汉字只有一个而推导出此日语语词也是一个音节。同样，古纳西文字——东巴经文字也是很好的旁证。一个东巴经文字可以是一个音节的语词，也可以是一个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语词，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短语甚至也可以是一个句子<sup>①</sup>。虽然，东巴经文字处于文字的原始状态，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不是文字。因为，东巴经文字也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尽管它和语词并不一一对应。

古汉字、上古汉语之间的关系与汉字、日语之间的关系相似，即古汉字所记录的是上古汉语的语词而不是上古汉语语词的音节。前苏联 B·A·伊斯特林，把世界上的文字划分为句意文字、表词字、语素字、音节字与音素字五种类型，其中汉字归于这五种文字中的表词字<sup>②</sup>。不过，根据古汉字的实际使用情况，比如甲骨文材料，我们认为还应该在这 B·A·伊斯特林五种文字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类型的文字，即短语字。所谓短语字，是指记录语言中一个短语的文字。这种短语字甲骨文中曾经大量存在过。甲骨文有相当多的文字所记录的并不是当时语言中的单个语词而是一个短语，其中数词与名词组合的短语以及专有名词用单个文字记录最为明显。比如“百”字，甲骨文中的意思是“一百”，是一个短语而非一个语词。因为甲骨文中在“白”字上加上“二”

付懋勳：《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载《民族语文》，1982，第一期。

② 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所组成的文字记录的就是“二百”。这一现象我们从西周初期的金文中仍有发现。如西周金文中的“斌”字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斌”，其记录的就是“文王与武王”这一短语。“文”和“王”组成的文字记录的就是“文王”；“武”和“王”组成的文字记录的就是“武王”。西周金文中“斌”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古汉字和上古汉语语词的音节无关，其记录的可能是好几个音节的语词或者短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曾经存在于甲骨文、金文中的短语字后来渐渐消失了。古汉字也逐渐稳定在字词之间的关系上，即上古汉语与古汉字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上古汉语语词对应一个古汉字。从句意文字到表词文字，是文字本身的一种发展。甲骨文、金文中的这些短语字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古汉字和上古汉语语词之间关系的事实：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的音节并不一一等价，古汉字和上古汉语语词或短语等价。一个古汉字所记录的并不是上古汉语中的一个音节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语词甚至是一个短语。

可见，就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的关系来看，B·A·伊斯特林把古汉字归入“表词字”无疑是十分恰当的。古汉字既然是“表词字”，那么就不可能把古汉字和上古汉语的语词音节联系在一起。一个古汉字所记录的是上古汉语的一个语词而不是上古汉语语词的一个音节。也就是，一个语词的意义通过中介——一个文字再现出来。当然，在上古汉语中（《诗经》时代）也存在一个语词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字记录的，如联绵词。不过这种联绵词甲骨文、金文中几乎不见，而联绵词相对于整个上古汉语词汇系统而言也是相当少的一部分。联绵词的出现，告诉我们古汉字的性质正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古汉字已经从记录语言中的语词向记录语言中的音节转变。上古汉语的一个语词用一个文字来记录，并不意味着这个被记录的语词就是单音节的。因为，古汉字所记录的是上古汉语的一个语词而不是上古汉语的一个音节，就

算这个被记录的语词是一个多音节的语词，由于只是一个语词，所以同样也只用一个古汉字来记录。文字是由描摹自然物的图画发展过来的。这些自然物的名称在上古汉语中不可能都是单音节的，但是甲骨文中并不存在用两幅图画来记录的自然物，不论这个自然物在语言中的具体读音如何。即并不考虑这一自然物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古汉字的创造者总是用一个近似此自然物形状的“图画”来记录。语义具体的语词是如此，语义抽象的语词也是如此。由于语言中总存在一些语义抽象的语词，不宜用象形来创造，于是古汉字的创造者又利用已有的象形字组成合体字——会意字来记录语言中的语词或直接采用一些抽象的符号——指事字来记录上古汉语中这些语义抽象的语词，如数词、形容词等。显然，古汉字的创造者不会由于某个语义抽象的语词在古语言中有数个音节而相应地为之创造几个古汉字来记录。如一划的“一”字记录上古汉语中的数词“一”用两划的“二”记录上古汉语中的数词“二”，如此等等。就上古汉语而言，那种把文字和语言中语词的音节联系起来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作为东夷部落的图腾——“凤凰”（或以为其原始版本为孔雀，甲骨文中表现长尾巴且有冠的鸟，其所描摹的形状和孔雀的形状基本一致），后来用“凤”和“凰”两个汉字来记录。但是，东夷族的图腾——“凤凰”在甲骨文里面却只用一个对这一动物描摹的图画符号来记录。自然，这一“凤凰”图画跟实际语言中的语词“凤凰”读音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它只是根据这一图腾的形状描摹下来的“文字画”。我们依据这一图画根本无法判断这一图画所记录的语词在实际语言中到底读什么，是一个音节的还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依据一个古汉字记录一个上古汉语语词音节的假设来类推，“凤凰”在商代应该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词。如同我们要是仅仅依照“斌”这一文字符号来类推，也会得出“斌”在当时是一个音节的语词这一结论一样。实际上，依

照“斌”等于“文王和武王”来看，“斌”不可能是单音节的。“凤凰”这一语词也是如此。“凤凰”一词的古汉字甲骨文中又出现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在原“图画”上加“凡”声符（《拾七·九》），一是在原“图画”上加“兄”声符（《甲·三九一八》）<sup>①</sup>。利用一些简单的古音韵知识，我们知道加“凡”声符的对应于后代的“凤”而加“兄”声符的对应于后代的“凰”。我们把两者合起来，读音正等于“凤凰”。可见，“凤凰”一词尽管甲骨文只用一个文字符号，但是其所对应的语词无疑是双音节的。“凤凰”之所以在甲骨文中只用一字而后来用两字，显然是汉字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表词字渐渐变成了语素—音节字。由于文字和言语语词的音节出现了龃龉，所以后人用了两个文字符号来记录。“凤凰”如此，许许多多的动物名词在上古的文字记录中都是如此，比如：

麇，其所记录的就是上古汉语中名为“麇”的一种动物——传说中的神奇动物。由于“麇”是基于这一动物外型的大略描摹，因而自然和这一动物在语言中的具体称谓无关，仅仅只是一个记录符号而已。也就是说，“麇”字和“麇”这一动物的具体读音无关，不论这一动物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词还是一个多音节的语词。不过，我们从古文献中可以得知记录这一动物的文字符号后来出现了变化。本来只用一个古汉字“麇”记录的动物后来却在“麇”字前增加一个“解”或“獬”字，即“解麇”或“獬麇”来记录，即用两个汉字来记录。《说文》：“麇”解麇，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广韵》：“獬，《字林》、《字样》俱作解麇。”可见，“麇”和“解麇”所记录的语词相同。那么，是否是“麇”这一动物本来只是一个音节的语词而后来演变成两个音节的语词呢？答案是否定的。“麇”

也可以写作“豸”。《左传·宣公十七年》：“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豸，解也。”可见，“豸”本来就含有“解”音，即“廌”也含有“解”音。如此看来，“廌”本来在实际语言中应该读为两个音节。

易，《说文》：“蜥易，蝮蜓，守宫也。”朱骏声云：“在壁为蝮蜓，守宫也。苏俗谓之壁虎。在草蜥易，荣蝮也。苏俗谓之四脚蛇。”“易”，《说文》以为象形字，其所记录的就是上古汉语中名为“易”的一种两栖爬行动物。“易”，由于是一种动物的名称，所以后来加“虫”作“蜴”。《诗经·正月》：“胡为虺蜴。”可见“蜥蜴”是可以单写作“蜴”的，即“蜥蜴”等于“蜴”。然而，许慎《说文》引《诗经·正月》作蜥，《释文》：“蜴，星历反；一作蜥。”这种名“易”的动物后来正称蜥蜴，用两个汉字“蜥”和“蜴”来记录。蜴不过是在易的基础上附加“虫”这一形符而已。蜥蜴等于易，即蜥蜴是易的分化。依据金理新的研究，上古汉语的动物名词常常附加\*<sub>s</sub>-前缀<sup>①</sup>。其中动物前缀\*<sub>s</sub>-实际就是“蜥”这一文字的来源，不过是上古汉语动物名词前缀\*<sub>s</sub>-的文字化而已。

狸，《说文》：“伏兽，似豸，从豸里声。”狸是一个形声字。豸，《广雅》：“狸也。”《方言》：“狸，谓之豸，亦谓之狸。”“狸”也可以称“豸”。“狸”和“豸”之关系与“狸”和“不来”之关系同。《史记·封禅书》：“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又《仪礼》注：“狸之言不来也。”“狸”和“来”上古同为来母之部，可见“狸”等于“不来”。要是“狸”是一个单音节语词，我们的先人何以拿“狸”作为“不来”的隐语呢？《周礼·大宗伯》“以狸沉祭山林川泽”，《校人》“及葬狸之”。其中的“狸”等于

金理新：《汉藏语的肢体与动物名词前缀\*<sub>s</sub>-》，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 第四期。

“埋”，而“狸”来母、“埋”明母。上古和“狸”相平行的还有“滫”。滫，许慎《说文》：“水涯也。”《尔雅》：“夷上洒下，不滫。”注：“不，发声也。”“滫”等于“不滫”。念，《说文》：“常思也。”《诗经·文王》：“无念尔祖。”传：“无念，念也。”念等于无念。《诗经·小旻》：“无沦胥以败。”《诗经·荡》：“无沦胥以亡。”沦胥等于无沦胥。这和“狸”等于“不来”，又通“埋”恰好一致。这一切都说明“狸”上古应该是一个双音节语词。

邂逅 本就是遘。遘，《说文》：“遇也。”此语音之语词上古多有“遇见”、“交接”等等意义。又覿，《说文》：“遇见也。”《诗经·草虫》：“亦既覿止”，传：“遇也”。媾，《说文》：“重婚也。”《易·屯卦》“匪寇，婚媾”，郑注：“犹会也”。讲，《说文》：“和解也”即所谓媾和。《史记·平原君列传》：“不如发使而为媾”集解：“求和曰媾”。蒿，《说文》：“交积材也。”构，《说文》：“盖也。”徐灏曰：“蒿、构古今字”。邂逅就是遘。《诗经·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传：“邂逅，不期而会。”《释文》：“遘，本亦作逅。”郑珍曰：“按，古遇谓之遘。《说文》：‘遘，遇也。’重言之曰‘邂逅’。《诗·郑风》‘邂逅相遇’，遘用本字。《唐风》‘见此邂逅’，遘借作覿，邂并俗改。《释文》云‘邂本亦作解’，乃古本也。又云‘遘本亦作逅’，则俗矣。”王力《同源词典》按：“郑说是。”

披靡，《史记·项羽本纪》“汉军皆披靡”。披靡 本就是靡。靡，《说文》“靡也”。《礼记·少仪》“国家靡敝”疏：“谓财物靡散凋敝也”。《荀子·大略》“利夫秋毫害靡国家”注：“靡，披靡也”。字也即糜，《荀子·富国》“以糜敝之”，注：“散也”。和“披靡”相似的还有婆娑、徘徊、盘旋、盘桓、彷徨、跋扈、蹒跚等等。这也跟我们所列举的狸谓之不来、滫谓之不滫、聿谓之不律完全一致。

徘徊 即回。回，《说文》“转也”。《诗经·云汉》“昭回于天”，传：“转也”。同源词族有洄，《说文》“溯洄也”。违，《左

传·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违，就是今所谓“绕开”。围，《周礼·考工》注：“圉之也”。透，《说文》“透迤”。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古汉字可以记录一个双音节的语词。这样的例子在上古汉语中真可谓是不胜枚举。如：邁与邂逅、念与无念、脐与毘脐、睨与俾倪、披与勃拂、靡与披靡、写与披写、狷与披狷、拂与披拂、瓠与瓠芦、蝶与蝴蝶、梯与胡梯、麓与胡禄、穀与句渎、吴与句吴、阑与句阑、蒙与唐蒙、矇与童矇、唐与啗啗、隶与唐隶、棣与唐棣、突与唐突、荡与倜傥、痾与痾倮、果与果羸、邾与郑娄、茨与蒺藜、头与髑髅、卷与卷娄、聿与不律、狸与貍狸、漚与不漚、烏与不借、蚓与蚯蚓、蝉与马蝉、蝗与蚂蝗、蛭与马蛭、蝮与马蝮、号与号咷、培与坎窞、癩与虺隤、混与混沌、空与空同、涵与涵澹等等。这些语词本来只用一个汉字记录而后来改用两个汉字来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汉字和两个汉字所记录的是同一个上古汉语语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记录连绵词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汉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记录语言中语词渐渐演变成记录语言中的音节。正如我们以上所列举的，许多连绵词实际上本来就只用一个文字来记录。由于文字已经从记录语言中的语词演变成记录语言中的音节，文字和语言中语词的实际读音出现了齟齬，于是就有了连绵词。上古汉语的连绵词，尤其是叠韵连绵词，两字之间就声母而言，其排列并不是很随便的，它们受到语音内在的规律的约束。实际上，上古汉语中出现的连绵词不过是实际语言音节结构的真切反映而已。这正反映了上古汉语并不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潘悟云师对上古汉语连绵词和上古汉语音节之间的关系有过较为详细的讨论<sup>①</sup>。我们就不再加以详细讨论了。总之，

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载《中国语言学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从汉字和汉语之间的记录关系的发展来看，那种从一个语词只用一个汉字来记录的现象推导出上古汉语就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的结论是难以站住脚的。相反，一个上古汉语语词本来只用一个汉字来记录而后再用两个汉字来记录的事实恰恰支持了一个与传统不同的观点——上古汉语极可能和其他同源语言一样是一种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

赵诚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析描述商代音系时认为谐声反映的实际是多音节问题。赵诚先生如此说：“看来商代某些字的读音正是多音节的，或者是两个音节的，有两个辅音两个元音；由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容易失落，久之保留了一个辅音，也就成了单音节。”<sup>①</sup>这一构想是十分有道理的，只是从许多语言的演变事实来看并不支持赵诚先生对商代音系后来演变的解释。侗台语从多音节演变成单音节的历史正可以支持赵诚先生关于商代语言可能是多音节或双音节的构想。就南岛语的发展来看，多音节语词在演变成单音节语词的过程中首先缩减前一音节，比如：

傣语 na :侗语 ja 毛南语 ꞑja: 仫佬语 ya :黎语 ia 印尼语 bna“低洼地”  
傣语 ia: 侗语 ta 毛南语 da: — 黎语 tsha 印尼语 mata“眼睛”  
傣语 ho: — 毛南语 ko: 仫佬语 kyo: 黎语 go 印尼语 hulu“头”  
傣语 hu :侗语 wo 毛南语 wo 仫佬语 yo: — 印尼语 tahu“知道”

以上我们所引的是罗美珍先生的材料。侗台语的单音节语词是由南岛语的多音节语词演变过来的。在演变过程中侗台语语言彼此之间的声母读音出现不同的差异。这说明谐声系统中出现的分歧也可能是多音节演变的结果。沙加尔通过汉语和南岛语的比较研究，认为汉语曾经在某一时期是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sup>②</sup>。金

赵诚：《商代音系探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②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1990,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5-7 October 1990. Arlington Texas U.S.A.

理新提出上古汉语实际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语言，其中一个词根音节而另一个是词缀音节，而词根音节是谐声系统中彼此谐声的依据<sup>①</sup>。潘悟云师也认为上古汉语不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sup>②</sup>。倪大白先生在比较了大量侗台语和南岛语同源词之后，认为侗台语的复辅音声母大部分是由南岛语的多音节词（主要是双音节词）演变而来的<sup>③</sup>。并且，倪大白先生进一步指出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有辨义声调的词根孤立型的侗台语诸语言确实是由多音节、无声调的黏着型南岛语发展来的，其变化途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以双音节为主的南岛语系诸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同族语言或方言，丢掉了语词中的第一音节的元音（或韵母），于是两个音节合二为一，成为复辅音，同时产生了在重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别意义的声调。

•随着时间的迁流和地域的推移，复辅音声母又进一步分化或简化，成为单辅音，此时又因声调清浊，音节中的韵尾的不同、脱落或整化而进一步分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由此，倪大白先生对汉语的发展提出这样的疑问：先秦的复辅音和声调是否也是由早期黏着型的多音节词演化来的呢？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而声调显然是音节简化的一种补偿而已。在整个汉藏语系中，有声调的语言显然是晚起的。这可以通过藏语安多方言和卫方言以及羌语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比较加以证明。同样，书面藏语复杂的复辅音也不是原始就是如此的。通过

金理新：《上古汉语舌尖塞音以及相关的前缀》，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未刊。

② 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载《中国语言学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倪大白：《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及发展》载《民族语文》，1996 第三期。

藏语跟南岛语的比较可以证明，藏语也不过是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而已。印尼语处于这个发展链条中最上一环节，而汉语只是这个发展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通过汉语、藏语以及印尼语的相互比较，可以证明汉语也是由多音节语言简化而来的。实际上，章太炎先生早就对古汉字记录上古汉语一个语词意味着这一语词是一个单音节语词的看法提出怀疑。章太炎先生据古文献材料以及《说文》本字只用一字而后世用两个字等事实提出这样的假设：古汉字有一字双音的。但是，章太炎先生的这一构想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直至近些年人们才意识到章太炎先生构想的真切。当然，有人或许会利用古汉字中的形声字来反驳这种看法，认为形声字不仅和上古汉语的语词相联系而且也和上古汉语语词的语音相联系。虽然形声字和上古汉语的语音有联系，但是形声字并没有突破古汉字一字一词的框框，即古汉字是一种表词字的性质。更何况形声字，甲骨文中只占百分之十几，还处于萌芽状态。更重要的是，正如象形、会意、指事字一样，形声字所依附的仍是上古汉语语词的整个读音而不是语词的音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先人逐渐注意到了文字跟语词读音之间的联系，文字性质也跟着慢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表词字变成了表语素一音节字。总之，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的假设可以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怀疑。我们现举一组以“女”为声符的形声字所记录的和印尼语有同源对应关系的上古汉语语词：

汉语女	印尼语	a-nak	“女儿”	汉语孥	印尼语	be-nak	“愚蠢、迟钝”
汉语怒	印尼语	ga-nas	“凶暴”	汉语孥	印尼语	pa-nah	“箭”
汉语奴	印尼语	hi-na	“卑贱的”	汉语孥	印尼语	be-nah	“收拾、整理”

汉语如 印尼语 ra-na “沼泽地” 汉语茹 印尼语 na-nah “脓”

汉语孥 印尼语 no-na “女子” 汉语如 印尼语 gu-na “如果”

汉语恕 印尼语 lu-nak “温和的” 汉语汝 印尼语 ke-na “你”

这一组上古汉语语词，全用以“女”为声符的谐声字来记录，而相对于汉语，印尼语为一组拥有一个相同音节 na（印尼语中词尾 -s -h -k 之间可以交替）的双音节语词。就汉语而言，尽管这一组谐声字上古同为鱼部字，但其声母却完全不是同一的，有泥母、娘母、日母甚至审母等。为什么古同声符而后声母却不同呢？印尼语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古谐声就在于各谐声字所记录的古语词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即词根读音相同。但是，词根之前的音节彼此并不相同，而词根之前的并不同音的音节的存在导致它们在《切韵》时代的读音不一致，即前缀的脱落影响词根辅音。和汉语有语源关系的语言，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以及现在认为有语源关系的南岛语都是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藏语（书面藏语）尽管有复杂的复辅音声母，但是藏语仍是一种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都是如此。以往的上古汉语语音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问题就在于研究者为记录上古汉语语词的文字所蒙蔽，把语言和文字等同起来。实际上，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记录一个上古汉语语词的古汉字实际所隐含的并非只是一个音节而是双音节。其中一个音节是词根音节而另一个音节是词缀音节。词缀音节由于是一个语词的次要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元音渐渐弱化最后脱落单单剩下词缀辅音。这个词缀辅音和词根辅音融合在一起构成复辅音声母。这只是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这个复辅音声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弛化、融合、脱落演变成中古汉语的单辅音声母，同时衍生出声调。这一过程也正是从多音节到单音节演变而来的语言的发展过程。我们所举的侗台语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比如侗台语有长短元音的对立。罗

美珍通过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台语的长短元音是从多音节变为单音节的过程中作为一种补偿现象而产生的。”<sup>①</sup> 这和倪大白先生认为侗台语复辅音声母来自多音节的缩减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侗台语本也是多音节语言，现代的面貌只是发展的结果。比如回辉话是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但是通过回辉话和拉德语、原始占语的比较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回辉话有声调、单音节的面貌是由多音节演变而来的。原始占语处于这一链条的第一链，拉德语处于这一链条的第二链，而回辉话则处于第三链<sup>②</sup>。事实上，汉语自身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那就是谐声。谐声关系所反映的就是双音节语词之间的一种关系：词根相同而词缀不同。相同的词根构成谐声关系，不同的词缀导致它们后来的读音不同。只可惜以往的研究者把文字和语言等同起来，受上古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语言这一假设的束缚而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汉语自身材料，并通过这些谐声材料重构上古汉语。

罗美珍：《台语长短元音探源一得》，《语言论文集》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商务印书馆，1985。

郑贻青：《论回辉话声调的形成与发展》，载《民族语文》，1996，第三期。

## 第二章 谐声原则

高本汉之后，上古汉语的语音研究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清儒的崭新的局面。但是，自高本汉以来上古汉语的研究一直在所构拟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础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多少令人特别兴奋的成果。正如潘悟云师所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事汉语音韵研究的学者缺乏对谐声原则的正确理解<sup>①</sup>。不过，经过无数学者的艰苦努力，尤其是随着同源语言材料在上古汉语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上古汉语的研究毕竟已经取得了许多数百年前的清儒不可企及的成绩。

很显然，我们要是连谐声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试图在音韵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无疑是不可能的。清儒以来人们缺乏对谐声原则真正的理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发生错误的判断，自然不自然地在上古汉语语音研究中死抱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要的语言的假设不放。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分析了上古汉语实质上并非传统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要的语言而是一种以双音节为主要的语言。实际上，我们只要了解了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就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谐声，也容易了解清儒在谐声上犯错误的原因。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所依据的材料很多，除去以下四种材料：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中的韵文材料，比如《诗经》等；现代汉语的方言，尤其是相对保留较

<sup>①</sup>潘悟云：《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 第四期。

多古汉语面貌的方言材料，比如闽语、粤语等；汉语在其他非汉语中的借词以及非汉语在汉语中的借词；汉语亲属语言的同源对应材料等。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最丰富也最有价值的材料还是那些含有上古汉语语音信息的通假、谐声等书面文献材料。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不能不利用这些能够反映出上古汉语语音信息的通假、谐声材料，而且近代就有不少学者正是利用这些通假、谐声材料而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董同龢<sup>①</sup>、陆志韦等<sup>②</sup>。尽管从事上古汉语语音研究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上古汉语的通假尤其是谐声材料，但是对于什么是谐声，这些学者们的仅仅只是清儒的那一套看法，比如清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等等。

显然，要是在连通假、谐声本身仍未弄清楚的前提下去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否为真是很值得怀疑的。或许，他们所构拟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压根儿就不是上古汉语语音，只是研究者自己所描述的一种人工符号而已。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无疑需要书面文献材料。假如没有上古汉语的书面文献材料，要想真正复原上古汉语的语言原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有学者希望利用现代汉语的方言材料，通过比较构拟而构拟出一个原始母语来。实际上，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上古汉语的许多语言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消失在现代所有的方言之中。正因为有记录上古汉语的书面语言存在，这使我们复原上古汉语的语言原貌有了一定的可能，尽管这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就文字的发展情况来看，首先出现的是那些形状可以直接描摹的“具体物”，比如老虎、大象之类的动物。陪伴而来的是数量极其有限的记录抽象意义的抽象符号，比

①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② 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中华书局，1985。